



此后十多年间，您一直坚持有关工人新村的研究。像您这样长期关注工人新村的学者，非常具有代表性。您能否先介绍一下，为何当年选取这一研究对象？

杨辰：于我而言，上海工人新村可以被视为学术研究起点。

从本科到硕士阶段，我一直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求学。

去到法国后，我先攻读了建筑学硕士学位。当时基于同济大学的求学生活经历，我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学校周围密集的沪东工人新村，选取凤城一村的住宅改造作为建筑学论文题目。当时还专门从法国回来调研，但没想到论文答辩之后大概五个月，凤城一村就被拆掉了。这大概是我与工人新村研究的最初结缘。

随着调研的深入，我意识到工人新村的研究变得有些困难。因为作为建筑师规划师，我最初关注的仅仅是老房子改造的问题；实际上，工人新村里蕴藏着丰富的集体生活、家庭关系和个人情感。在对住宅改造之前，我们无法避开这里居住的人。

特别是在上海，即便一个看似很普通的工人新村，其内部的情况也非常复杂。这些新村往往不是同一时期建造完成的：不同时期的户型不同，建设标准不同，服务对象也不一样，背后是不同的分配单位和家庭结构。像最近刚完成改造的彭浦一村，改造前原有户型有 282

种！这是工人新村复杂性的一种体现。

因此我明白，工人新村研究不是仅靠城市规划或者建筑学视角就能完成的。带着这股热情与冲动，我选择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（EHESS）的城市社会学作为我博士研究的方向。从 2006 年开始，一直到 2012 年毕业，我在此完成了从“建筑师”到“社会学”学者的转向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在法国攻读博士期间，不仅跨学科，而且选择了一个远在中国上海的研究对象。这会不会存在一些困难？

杨辰：我的博士论文导师，是研究院“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”（CECMC）的 Francois Gipouloux 教授。他本人对中国怀有极大兴趣，是那个年代法国左翼学者中“毛泽东主义”（Maoism）的信仰者。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到访过中国，并在广州、上海和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做调查，对中国工人有深入的研究。

在上述机缘下，我得以继续工人新村的研究。对我来说，这的确是一次跨学科的尝试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将社会学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，运用到传统空间规划的研究对象。特别是接受了社会学训练，让我对上海工人新村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虽然只迈出一小步，但新的发现仍然令我感到欣喜。

当然，跨学科研究肯定会碰到困难和挑战。毕竟我在建筑学、城市规划领域学习了近 8 年，视角转换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。在与导师和其他社会学者讨论过程中，我能明显感觉到“穿透空间到社会”的分析能力依然不足，但建筑师对城市空间特有的敏感和分析方法，也会给社会学带来启发，这大概就是学科交叉的意义吧。

巴黎和上海相隔近一万公里。为查阅档案资料和调研工人新村，博士 6 年间我一共回国三次。当时，我选择曹杨新村作为研究对象，不仅因为它在上海的工人新村中知名度最高、最具代表性，也因为作为 1949 年以后新中国第一个建成的工人新村，历史资料相对丰富。

2008 年第一次回国，我主要在曹杨街道、普陀区以及上海市的各级档案馆里搜寻相关资料。

凤城三村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征询首日同意率达 100%。

